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 韩庆祥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其文明底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抓手,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源泉,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借鉴,以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主体,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方向。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较大成就,使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随之产生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及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产生影响,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也把世界卷入现代化运动之中。西方进一步把“东方从属于西方”看作宿命。

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从1840年开始。从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一次次被动回应。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一改过去被动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也一改过去外逼式现代化为内生式现代化,取得的总体性重大成果是开创并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确立并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种转变源于以下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我们党在思想文化上拥有消除错误思想并统一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引;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在组织上有了整合中国社会力量、团结各种积极力量的领导核心;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在根脉上有了凝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力量;四是人民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与目的,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扎根人民上有了道义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并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展现的。其中,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主要源于中华文明。

第一是提出“走自己的路”。在逻辑上,“走自己的路”具有“破”“立”“走”三层内涵。

“破”,就是不走“别人”的路尤其是歪路和邪路;“立”,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走”,表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自己“走”出来的,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进行探索、开创和开拓。在实践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自己的路既体现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具有自主性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走自己的路既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致力于在农民工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上述逻辑和实践看,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道路问题上的重要体现。

第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走自己的路”被赋予时代内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致力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承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直接且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走得稳走得宽走得好的,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独立自主的,具有主体性、创新性。

第三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道路区别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现代化道路”这一框架中加以解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首先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华文明中生且拓展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开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第四是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格局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

主体性,更持久更鲜明的是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丰富内涵,是“第二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文明形态:它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内核,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以文化强国建设为实践基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文化样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旗帜,使我们党把握了历史主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和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独特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时代内涵;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又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魅力;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展和升华的集中体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指明了方向、目标和路径;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和引领力,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坚实基石、文化本体、生命滋养和根本路径,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把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新的使命,以建设文化强国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古今”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实质是

破除“文化虚无主义”,解决了“古”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为今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文化支撑,也彰显其时代价值,解决了“今”的问题。

“中西”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民族和人类、特殊和普遍的关系问题。其要旨在于突破传统“西体中用”“中体西用”观点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不能坚持“西体中用”,不是以“西”为本体、主体,也不能简单主张“中体西用”,而是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文化本体,即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先进、合理的成分。这就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解决了“中西”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现代化之问”

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遭遇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复杂矛盾和难题,可称为“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助于破解“现代化之问”。

一是如何确立现代化目标。即在目标追求上,现代化是坚持物质至上、资本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类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问题。由此,在西方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便滋长出一种单向度发展的物质主义。如果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对物的依赖,物对人进行统治,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在这种情境下,一个根本问题被提了出来: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坚持物质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还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华文明强调“民为邦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问题的同时,也注重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求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推进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解决了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目标追求问题。

二是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即在道路选择上,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是立足中国国情实现自主发展?西方率先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视为“边缘国家”“依附性国家”,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现代化模式对许多国家产生较大影响,但一些国家一味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并未能走向繁荣富强稳定,反而导致社会分裂动荡。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强调革故鼎新,注重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现代化,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现代化。走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和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在道路选择上,各国应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三是后发国家如何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即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是被动从属于西方模式,还是主动发挥后发优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其显著优势,后发国家因“时空压缩”而具有诸多劣势,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沿袭西方现代化模式。历史和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要么成为西方的附庸,要么难以取得成功。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这种道路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需要避免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还可以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发挥自身优势、补齐自身短板(如资源、环境、科技、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约束)、打牢自身发展基础的现代化道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克服了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和弊端,如单向度发展、两极分化、殖民主义扩张等,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中国奇迹的独特发展道路,为后发国家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原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7日第13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阐释

理论 前沿

传承抗洪精神 赓续咸宁担当

○ 邓昭

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三大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锐意进取的历史实践曾由湖北人民开拓,其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更在荆楚大地凝聚。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之际,我们要继续弘扬“三大精神”。咸宁作为“三大精神”之一的抗洪精神重要发源地,尤其要深刻把握抗洪精神内涵,深度串联咸宁精神内核,深扎根咸宁当地实践,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筑牢咸宁高质量发展精神堤坝。

一、荆楚潮涌铸丰碑:抗洪精神的咸宁基因与历史溯源

1998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抗洪抢险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具有丰富内涵,既包含咸宁人民抗洪救灾的生动实践,又彰显咸宁地区奋力斗争的品格风范。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彰显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灾情就是命令,在洪水威胁鄂南大地的危急关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调度下,各级党组织立下“军令状”,竖起“生死牌”,成为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与洪魔殊死搏斗的战斗堡垒。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危难时刻,广大人民群众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人为集体,党民一心,军民同心、全国齐心,团结友爱、并肩作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展现艰苦奋斗的责任担当。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抗洪救灾的旗帜。面对灾难,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迅速奔赴防汛抗洪最艰险的长江防线,为抗洪救灾作出巨大贡献。空军某高炮团指导员高建成,在簰洲湾决口中,先后救出8名群众和战士,终因体力不支,被巨浪卷走,壮烈牺牲;原广州军区某部战士李向群,带病坚持抢险,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年仅20岁。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昭示威武不屈的民族意志。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历经磨难的斗争史。在整个抗洪斗争期间,全市共投入抗洪抢险资金1.27亿元,排除各种大小险情3650起,抢筑子堤145公里,战胜长江8次大洪峰。“没有过不去的火

焰山。”短短三四个月,在国家、地方各级政府资助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簰洲湾人民战胜困难重建家园,所有受灾群众春节前搬迁新居。党和人民用生命守护生命、用平凡铸就非凡,生动彰显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意志。

二、精神长河激流:抗洪精神与咸宁精神的共生共荣

“厚德尚学、勇毅笃行”作为咸宁这座城市的精神代表,是其发展的动力之源、方向之舵。它充分凝聚了咸宁城市灵魂素养,传承了咸宁历史文脉,彰显了咸宁特色风貌,展示了咸宁人民精神气质。它与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虽诞生于不同历史场景,却有着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二者均以人民为中心,以行动为根基,共同诠释了中华民族面对危难与挑战时的集体品格与价值追求。

“厚德”是集体主义的道德根基。厚德者,深厚之德也。抗洪精神中“万众一心”彰显的集体主义,是咸宁厚德精神的充分体现——以仁爱之心守护生命,以奉献精神凝聚力量。1998年簰洲湾决堤时,19名官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公而忘私”的壮举,是“民为邦本”的厚德情怀在危急关头的极致体现。

在咸宁,辅警舒诚树火场中肩扛手拉救出4名儿童;村民李茂秀跳水救女孩后捐出奖金。“厚德”化为市民日常善举,与抗洪精神一脉相承,共同诠释了以无私诠释大爱的道德高度。

“尚学”是知行合一的传承创新。尚学者,崇尚学习也。从古人“改道为疏”的治水方略到1998年抗洪斗争中“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这种创新意识融入咸宁抗洪实践,并逐步构建现代防洪工程体系和水域生态治理的制度。以历史总结经验,用知识赋能实践,在传承中创新,这是咸宁“尚学”精神的延续深化。

新时代,硕士新农人田淑娴创新“菌-藻-稻-虾-鸭”生态模式、通城“兴贤夜诵”读书会融合传统文风开展理论宣讲、“理响咸宁”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语言、簰洲湾抗洪纪念馆的建设,将抗洪事迹转化为红色教育资源,契合“尚学”的知行合一理念。咸宁“尚学”文化基因,推动抗洪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勇毅”是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勇毅者,笃行以致。抗洪精神中“坚韧不拔”的特

质,是咸宁“勇毅”精神的生动注解。面对洪峰冲锋在前,以血肉之躯筑起防线。1998年咸宁军民喊出“人在堤在”,战胜8次洪峰;高建成、李向群等烈士以生命践行誓言。

咸宁民风淳朴,前有“青年楷模”何功伟、“红色教授”钱亦石、党内“女包公”钱瑛等革命英烈前仆后继;现有龙运娥40年守护烈士陵园,徐桂梅30多年煮凉茶温暖路人,“逆游老兵”周尚洪带病跳河救人。无论是追求革命理想的矢志不移、冲在抗洪前线的坚持不懈,还是面对生活磨难的顽强不屈,咸宁的“勇毅”精神刻入了城市基因,化为了行动准则。

“笃行”是实干兴邦的责任担当。笃行者,勇毅为始。抗洪精神中“敢于胜利”的担当,是咸宁“笃行”精神的高度诠释。抗洪期间,从部队官兵到普通群众,从科技工作者到医护人员,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簰洲湾灾后仅4个月重建家园,受灾群众春节前入住新居,以行动兑现承诺,印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近几年,咸宁市委、市政府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决心拼搏赶超,全市上下众志成城开展“万人洁城”文明实践,推动文明创建走深走实,新增公园、步道、小游园百余个,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五年位居全省前列,最终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抗洪精神中的“敢于胜利”与咸宁的“笃行”,共同诠释了以行动诠释信仰、以实效检验初心的实践哲学。

抗洪精神与咸宁精神同频共振:“厚德”铸就为民本色,“尚学”激活创新动能,“勇毅”锤炼斗争风骨,“笃行”书写实干担当。在咸宁,抗洪精神已融入城市血脉,是激励全市人民奋勇向前的重要精神旗帜。

三、砥砺奋进启新程:抗洪精神赋能咸宁高质量发展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从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到新时代绿色崛起,咸宁的发展实践证明抗洪精神不是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历史遗产,而是流动在长江之畔、扎根于幕阜山间的活态基因。从防汛抗洪到水域治理,从区域协同到产业转型,从绿色发展到民生改善,这一精神始终指引着咸宁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应对挑战,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开拓新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贡献咸宁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培育耐心资本既要“引导”也要“放活”

培育耐心资本,政府的有效引导至关重要。这种引导并非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科学的政策设计和精准的资源配置,为耐心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使其更好地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首先,优化财税激励政策,提升长期投资吸引力。其次,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催化剂”与“风向标”作用。政府引导基金应进一步优化运作模式,更多地投向市场失灵、社会资本不愿或不敢进入的早期创新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强化此类基金的“耐心”属性,适当放宽对短期回报率的考核,更加注重其对社会资本的撬动效应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效果。最后,构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项目甄别与推送机制。提升精准识别具有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的企业与项目的能力,确保这些项目能够被有效发掘并进入耐心资本视野。同时,建立跨部门、多领域的专家咨询评估体系,对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产业链安全的关键项目进行筛选、评估和认证,形成优质项目库,向合格的耐心资本进行精准推送和对接。

耐心资本的培育,离不开一个健康、高效、富有活力的资本市场环境。“放活”的核心在于遵循市场规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打通资本“募、投、管、退”各个环节,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首先,资本的“耐心”并非无限,畅通的退出机制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关键前提。应畅通多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创新企业通过IPO、并购重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实现价值变现。特别是要进一步提升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板块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为早期投资者和长期资本提供灵活、高效的退出路径,形成“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格局。其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培育耐心资本的重要保障。要营造公平竞争、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让长期投资者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敢于进行长期布局。最后,培育耐心资本,需要在激励与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

(本报综合)

弘扬三大精神 奋力建成支点